



新幼稚教育

第一章 我國三十年來幼稚教育的回顧

幼稚教育是指二足歲到六足歲這一段時間的教育而言。若把這一段時間的教育，按着兒童心身發展的程序，又得分做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從二足歲到四足歲，是嬰兒園 (Nursery School) 的教育；第二時期，從四足歲到六足歲，是幼稚園 (Kindergarten) 的教育。我國近年來，除上海北平已有類似嬰兒園性質的學校外，其餘還未經多見；現在爲便於研究起見，所以本編內容擬專重於幼稚園教育。

查我國舊籍，雖亦有「教子嬰孩」「聖功始基」之說，似乎也很重視幼稚的教育，但總沒有具體的方法。胎教，傳自三代，然而國家既沒有把它定爲法令，民間

又沒有流轉成俗，最多也不過見之於士大夫譽墓之文罷了。前清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張之洞、榮慶、張百熙改訂學堂章程，始明白提出幼稚教育的辦法，但因當時不主張設女學，乃將蒙養院附屬於「各省府廳州縣以及極大市鎮」之育嬰堂、敬節堂內，經費就由該堂等開支。其目的專為「保育教導三歲以上至七歲之兒童，發育其身體，漸啓其心知，使之遠於澆薄之惡風，習於良善之軌範。」教師就由堂中現有識字之乳媪，傳習官廳所發保育要旨條目及孝經、四書、烈女傳、女誡、女訓、教女遺規等材料中選出來的官編教科書。我們看到前清當時訓練師資的不合理，更看到用這樣的材料怎樣去教兒童，真是使人不但發笑，更代為焦急。那時民間方面呢？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秋間，聘日本保姆三人，立蒙養院於武昌，北京京師第一蒙養院也於是年成立，並辦有保姆師範，院長由日本保姆師範畢業，又聘日本教師二人，修業期限定為五年。但那時的蒙養院所收的學生，都是六歲到十歲。隨後上海務本女學、愛國女學、無錫競志女學以及北京、天津名公巨卿間聘日

本保姆以教子女者亦頗有人。光緒三十三年，吳朱哲女士從日本保姆養成所學習歸國，創辦保姆傳習所於上海公共幼稚舍，從學者三十六人。同此數年間，廣東等地方也漸設立。這一時期，蒙養院保育的要旨，固由於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之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程推闡而來，就是師資也大多數無不直接間接仰給於日本，甚至於教材也都是使用從日本攜來的那些熟料。由是內地所謂乳娘出身或類似乳娘出身的教師們都起而做效。其教法仍舊根據從前書房式的背誦記述；其教材不過把三字經、百家姓變做了遊戲、歌謠、談話、手技罷了。要形容這一時期的幼稚教育，實在和現在注入式的小學十分類似。他們將談話、排板、唱歌、識字、積木等科目，一個時間一個時間規定在功課表上，不會混雜而且也不許混雜的。教師高高的坐在上面，蒙養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師教一樣，學生學一樣，全體活動不脫教師的示範，兒童不能自己別出心裁，也不許其別出心裁。至於各種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師不給，兒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兒童雖欲

取而不得，管理上的嚴肅主義，也和現在注入式的小學一樣。在這種教育底下，我姑且不評論其價值，但最感困難的，是教師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兒童教會，兒童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教師所教的學會，教師是機械的，兒童是被動的，雙方都充滿了壓迫的苦悶，所學得的盡是零零碎碎的知識技能，都是浮面的，虛偽的，日子稍久就立刻忘懷了，忘不了的最多也不過照樣的反覆一次罷了。這種教育，在現在雖因環境的淘汰，不無多少的變更，但在社會上還可以尋出其不少的舊痕遺跡。

當日本式的幼稚教育瀰漫在國內空氣的時候，同時社會上却另有一部份的勢力侵入；因為這種勢力侵入的方式取在「潛」的一方面，所以表面上沒有激烈的變動，然也因其負有悠長的歷史，自然總難免有發生效力的一日。當時我國辦理幼稚教育的機關，很有趣味的，有兩種名稱：一種叫做蒙養院，一種叫做幼稚園。代表蒙養院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那一種代表幼稚園的却是出於教會的手澤。後一種不同於前一種的，是有美麗的教室，小巧的設備；在一時動作以後

茶點以前，兒童們一定要閉一忽兒眼睛，他們的小嘴一定還要唱一隻禱告的歌曲；早晨相見，放學，話別，「上帝祝福」詩一樣的調子，全從舌端跳到恬靜的空中，飄宕在這邊那邊。他們的心靈是甜美的，精神是活潑的，因為他們所受的材料都是從西洋直接的翻譯過來，是已經經過了多少教育者的匠心精選。至於教法，也是向西洋局部的摹擬。這種教育多半操於一知半解西洋傳教士的太太們，利用國內教會出身年輕的女子。在光緒二十八年，教會辦的幼稚園已經有六所之多了。自後，更日益擴充。他們不但在內地辦幼稚園，且也辦有幼稚師範，如北平的燕京、蘇州的景海、杭州的弘道、長沙的雅禮，都是辦理過畢業多次；從這些學校畢業出來服務於社會者，為數實在不小。因為當時的教會和我國舊倫理差得太遠，所以引不起知識階級的注意，且為代表知識階級的士大夫所輕視。宗教不能和士大夫相結納，自然不能借重統治階級的力量，只得回過頭來向無知識的貧民方面去做工夫。因為歷史的背景如是，所以我們很可以明白：教會式的幼稚園，成立

雖早於張之洞等改訂學堂章程，但學堂章程的釐定不取材於國內現成的幼稚園，却完全借鏡於日本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之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程的緣故了。我們又可以明白，教會設立的幼稚師範開辦如是之久，却沒有把西洋福祿貝爾（F. Froebel）等幼稚教育原理或其他教育名著，有系統的給國人介紹；就是零零碎碎彙譯過來的唱歌遊戲等材料，若和其本文相比，不但失去了原有的美麗辭句，而且都變成了惡劣粗俗的文字。所以這一種的教育，我們姑且拋開了教育的目的評論，即據其「模擬」的一點言之，亦頗感到缺陷：（一）當時效法西洋，間接者多，大半都是出於留華西教士的指示（我國年來雖不乏外洋求學之士，但為數過少，其影響不在此）；隨學隨教，所以只得其皮毛，而沒有整個原則的依據。（二）教會出身的女子，多半家境貧寒，年齡又輕，甚至連本國史都不十分明白，自然只會盲從，且國文的修養極淺，更易流於機械的模倣，馴致屏棄本國有用的材料，偏重累贅的譯文。如果根據當時實施的教材，探究其活動的功用，其能對得上「生

理「本能」的發展者已是了不得的教師。若再進而追問其兒童生理若何，本能若何，而幼稚園實施是否對於他們的生理本能都已經包括無遺，就恐怕沒有人能夠對得上了。像這樣的只顧盤運西洋片斷的熟料，移到國內來應用，材料既感缺乏，實施又是機械，兒童雖因教材的適合略微覺得興味，然而只有被動的瞎學，却沒有所以要學的動機。這種現象在現在幼稚園裏，也不能說是「沒有。」

這兩派的幼稚教育，在國內同時並進，一直到了民國八九年的時候，小學革新的運動，漸影響到了幼稚教育，另開闢了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和民元教育法令，民五國民學校令，也不能說毫無關係，（因為數量加增了，質量也當然要起變化。）我們記得在這幾年中，杜威博士的來華講演，各地參觀團體的紛起，以及附小的種種試驗，全和幼稚教育的改變有密切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有一種條件爲我們不可忽略的地方，就是日本式的保姆養成所，一年比一年的遞減，而教會培植的人才却一年年的繼續不斷的出來。保姆的人才由非教會養成的既日益缺乏，

而幼稚園的數反日益加增；社會既不能拒絕教會的師資而停辦學校，教會的人才也不能不斟酌社會辦事人的旨趣而犧牲了一部份宗教的儀式；融匯貫通之外，再加上其他種種——如上所舉——的刺戟，於是却打破了從來模仿的公式，開始革新的記錄。這記錄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不是方法的調和，也不是材料的擴充，而是課程的組織。代表這一時期的課程，是論理組織法，然而也已經能夠注意到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一年四季裏的變化了。五四運動以後，人民外受國際的刺戟，內感思潮的震動，才智之士聯袂奮起，在教育界的就想在教育界裏振作起來；當時第一種的好現象就是出版物數量的急進。關於教育的書籍，尤其是小學教育的，漸漸有人從數量方面改到質量方面去研究，而國內有名的大學，如北大、東大頗有不少的名教授，不但喜歡介紹世界學說，且也有親身作試驗的。幼稚園經民十一年教令第廿三號學校系統改革案之公布，在學制上確定了地位，但教育內容的改進却是到了這一個試驗時期（民十六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這時候

北平、南京、上海各有幼稚教育研究會的組織。京市每月開會兩次，討論幼稚園課程問題，並責令會員試驗。是年冬這個運動推到鄉村裏去，辦鄉村幼稚園。前於此的，有南京鼓樓幼稚園，出版幼稚教育月刊與叢書，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才漸漸的露出光明來了。民十七全國教育會議通過幼稚教育議案七件，中有全國實驗學校必須設立幼稚園，以及起草幼稚園課程等。十八年全國中小學課程起草完成，其中關於幼稚園課程列爲專項；河北省教育廳且令各縣設立幼稚園及女子師範添立幼稚師範科，十九年全國教育會議將幼稚園與小學並立，二十年以後，國內有名大學——北大、師大都加幼稚教育科目，各省如山西、綏遠亦先後由省教育廳令籌備幼稚師範科及模範幼稚園。其他私立的如北平的香山慈幼院、廈門的集美、上海的幼稚師範更竭力做試驗的工作，已有的也正謀發展。從此幼稚教育的事業，將因專家的研究，小學的合作，社會的需要，而日益進步。但數量之外，質量上究應如何適合國情及生活的需要？我們參考歐美近百年來幼稚教育

目標的演進，觀察國內自己兒童發展上實際的情形，實尙有待於慎詳的研究。

▲可供研究的問題：

- 一 我國正式設立幼稚教育的機關開始於何時？
- 二 那時政府和民間對於幼稚教育的計劃如何？實施如何？
- 三 教會所辦的幼稚園爲什麼引不起當時的注意？後來怎樣？爲什麼？
- 四 近十年來幼稚教育的情形如何？

第二章 近百年世界幼稚教育目標的演進

我國從來是閉關自守的國家，自從和國外接觸以來，經濟、政治等一切的一切幾乎沒有一樣不受其影響，現在我們要研究幼稚教育，所以也必須先攷察明白國外幼稚教育的起源及其演進。我們都知道創設幼稚園的是一位德國人福祿貝爾（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ebel），但福氏創造幼稚園的理想和他實際的工作，不能說是完全由於他個人特殊心靈的流露。福氏的思想，福氏的行動，全不能跳出他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其個人生活的關係。福氏生於十八世紀的末葉（一七八二——一八五二），正是歐洲君主專制到了將完的時候。統治階級爲想維持本身的利益，施威作福，人民既沒有法律的保障，一紙文書，隨時就可以加以拘捕和監禁。在財政的一面，自經三十年和七年戰爭以來，都是弄得國庫空虛，民

生憔悴，再加貴族僧侶等重重剝削，厭惡舊制度的在社會上成爲普遍的現象。像盧梭 (Rousseau) 的主張「回到自然」(go back to nature) 實足以代表那一時期一般人的心理。至於宗教，雖已經經過了一次的革命，但新教勢力的進展很快，早佔有了人們心裏的威權。各種科學除天文、幾何、古文學新從僧侶手裏奪過來，本來極其幼稚，心能學派的心理學主張形式訓練，當然誰也不會想到有可疑的地方。這些代表時代的哲學宗教——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全和福氏學說與實施有密切的關係。况氏從小生長於德國杜林根 (Thuringian) 森林裏一個村落中，他的家庭又充滿了宗教的空氣，請想一個無母的孤兒，又沒有受有系統的教育，逐日徘徊於深奧的山林，眼睛所接觸的種種的自然物和自然現象，既無人可問，不得不反求諸己，偶有所得，便覺會心不遠，那末後日「一原」的持論，安知不胚胎於這一個時期。十歲時他舅父命他進了小學，在這一學校裏他最喜歡宗教和算術。十四歲那年，他父親又叫他回來，在家沒有事做，只好到森林管理場裏去

做學徒，在他學識上雖沒有別樣的增進，倒是因爲平日自己本着一種宗教上的精神和自然界相周旋，更堅定了萬物「一原」的哲理。後來由場主的幫助，進了耶拿 Jena 大學，深受唯心派哲學的影響，可惜不到三年，終因學費不繼，半途退學了。氏回家後，翌年喪父，困於生活，荏苒四年，直到一八〇五年（氏二十二歲）在法蘭克福（Frankfurt）擔任建築，因認識了裴斯泰老齊（Pestalozzi）式模範學校校長古魯納（Anton Gruner）。古氏說他有教育天才，並在該校內給他一個位置。從此他得古氏的指導不少，遂把裴氏的學說做一番系統的研究。他和古氏合作的時候，也曾去參觀過裴氏的教授。一八〇八年，氏爲研究計，往學裴氏於衣浮墩（Yverdun）。對於地文、博物、兒童遊戲、母教及音樂等，都大有所得。一八一二年，氏震於柏林礦物學教授威士（Wies）的盛名，轉入柏林大學，受學於威氏。他所最信服威氏的，就是「凡宇宙間之發展，俱有聯屬之關係，可以實地證明者也。」的議論，所以他宣言道：「今後余之岩石，余之結晶體，俱可爲余之鑑，余將因之以識

別人類，洞悉吾人之發展與其歷史者矣。」於是遂成立其神秘的「一原」律，而爲其一生學說事業的發軔了。一八一三年因普法戰爭，氏加入普魯士義勇軍，在軍中認識了倫葛泰 (Langeta) 和墨登託 (Middendorf)。一八一四年退伍歸來，充柏林大學礦物博物館助手，利用空時復研究盧梭 裴氏 等思想。一八一六年，他親任他五個侄兒的教育，希望築成他自己的教育原理。翌年得倫墨 二友來助，於杜林根 瞿荷 (Kellhan) 村創辦一所「全德教育院」，利用兒童自己活動去治各種學科，實爲後來幼稚園的濫觴。一八一八年秋，與富家女 H. W. Hoffmeister 結婚。一八二六年氏的名著人的教育 (Education of man) 告成，俱載其瞿荷 所實行的原理學說；可惜其所辦之學校抗不了外面的流言，隨後就又停頓了。於是氏再百計想計畫一個別的地方，不但能安頓他自己，而且還有擴充的可能，最後他就到了瑞士。他在瑞士 飄泊了五年，始終未放棄教育事業，當一八三五年辦理堡村 (Bursdorf) 一所模範學校的時候，他忽然悟到一切學校教育，其始教之道到

現在還沒有適當辦法，不改良蒙養教育，是無效的。因之，他深注意到「智能的訓練，與能幹母親之必不可少，」於是一面研究，一面徵求有益於兒童的遊戲、歌曲、玩物以及一切的身體運動；不過在當時所得的都是很散漫的材料，而同時並感到設立保姆養成所的必需了。隨後因他夫人的病，重返德國，乃於一八三八年，在白蘭慶堡(Blankenburg)又設立了一個學校，專收三歲到七歲的孩子，不久他就將這個學校定名為幼稚園——這就是世界第一個幼稚園。他在那裏重新將瑞士所搜集的材料整理出來，並隨時又吸收當地新材料。不幸他夫人於次年去世。一八四三年，他發表了一種星期學報，所登載的全是各種詩歌和遊戲，在這許多的詩歌和遊戲的中間印成了母遊戲的單行本，實為具體描寫人的教育中原理方法一本有威權的著作。一八四四年以來，他和友人墨登託遊歷全國都市，提倡幼稚園教育，到了一八四七年，全國幼稚園已達到了十所。一八四九年，設立保姆養成所於李伯斯特 Liebenstein 溫泉場內，續娶一位從前在幼稚園中最得他歡

愛的教員爲妻。福氏在這一時期又得布洛男爵夫人 (Baroness Berthe Von Mar-
enholtz Butow) 厚誼的盡力，引得一班政界教育界許多名人的注意及許多婦人的贊助，並得到一塊偉大的地址，爲他設立學校之用。那料到一八五一年八月，普魯士政府突下令停止該處所有的幼稚園，氏和其同志竭力疏通，終歸無效，懊惱過甚，到了一八五二年六月溘然長逝了。直等到一八六一年政府始取銷禁令；一八七六年更承認幼稚園爲國民教育的初等階段。但在世界，英國因男爵夫人之友耳郎治夫人 (Madam Ronge) 的提倡，於一八五四年成立幼稚園。法、比、荷、俄、意、瑞士等國也因夫人傳播福氏幼稚園根本思想的努力，各國政治家、學者、著述家、復協力提倡，先後舉行福祿貝爾學說講演會，並設立幼稚園。福氏後妻頗能繼續福氏的事業，更於一八五四年在漢堡 (Hamburg) 成立保姆養成所。美國於一八五五年，由福氏門人爲留美德人的幼兒們設立一所幼稚園，隨後披鮑墜 (Eлиза-
beth P. Peabody) 女士更竭力提倡。披氏在美對於幼稚園的熱心，實不減於歐洲